

关系理论视角下中国 对非医疗援助探析

翁 凌 飞 孟 飞 丹

内容提要 对外医疗援助是中国参与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有效路径，而无偿提供公共卫生产品则是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外交战略，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内在逻辑值得深入探讨。非洲是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重点地区，本文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现实背景，以中国对非洲国家的医疗援助为研究对象，通过中国话语体系的构建，立足关系理论的视角，并在“关系互动实践——关系选择——关系建构”的分析框架下，探讨中国同非洲国家间医疗援助与受援的互动过程，以此尝试进一步建构中国对非医疗援助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关键词 中非关系 关系理论 医疗援助 公共卫生产品 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作者简介 翁凌飞，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重庆 400000）；孟飞丹，重庆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重庆 400000）。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扩大。气候变化、新型传染性疾病蔓延等全球性问题正影响世界各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甚至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当下，如何更好地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已成为国际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之一。从人道主义出发，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医疗援助正逐渐成为一种典型的全球公共产品。^① 派遣援外医疗队既是中国实施对外医疗援助的有效途径，也是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形式。作为受传染病侵袭最严重的大陆，非洲是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重点地区。本文以

① 秦亚青：《新冠肺炎疫情与全球安全文化的退化》，《国际安全研究》2021年第1期，第4—27页。

中国对非派遣医疗队 60 周年为契机，基于关系理论的视角，梳理和分析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对外援助是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途径，是一国向另一国提供无偿或优惠性质的物资，以帮助解决受援国面临的政治经济困难或问题的一种手段。^① 对外医疗援助则是全球公共卫生治理的重要议题。非洲是全球医疗卫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最脆弱的地区之一，通过更为有效的医疗援助向其提供更多的公共卫生产品，是对习近平主席提出加大对非洲国家支持、加强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及国际合作的积极响应。^② 未来，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及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然而，不同于西方国家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的对非医疗援助，中国对非医疗援助深深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关系本位”，因而需要从中国本土的关系视角进行阐释。

本文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为研究背景，以中国对非医疗援助为研究对象，立足关系理论，通过梳理中国同非洲国家间医疗援助与受援的互动过程，尝试探究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内在逻辑（如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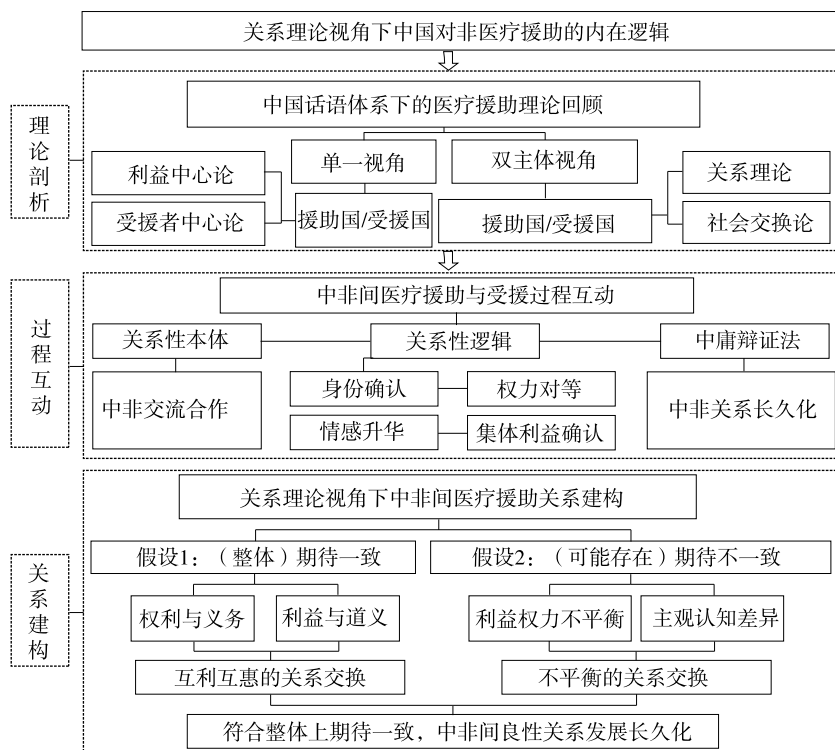


图 1 本文研究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①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经济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版，第 216 页。

② George Fu Gao and John N. Nkengasong, “Public Health Priorities for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The Lancet Public Health*, Vol. 4, No. 4, 2019, pp. 177 – 178.

中国对外医疗援助的理论探究

在国际援助领域，随着中国的表现日益活跃，中国对外援助受到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有关医疗援助的研究成果中，“利益中心论”和“受援者中心论”是两种主要的理论观点。

“利益中心论”认为援助国是自私且理性的行为体，国家对外行为主要是为了获取国家利益，即对外医疗援助只强调自身利益，相对忽视受援国的医疗需求。^①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对外医疗援助是基于“民生”的价值取向，而西方则是以自身利益为主导的“民主”取向。^②

“受援者中心论”强调国际道义与伦理规范在对外医疗援助中的重要作用。该理论认为人性本善，富裕国家帮助贫穷国家是一种责任和义务。中国对外医疗援助常常以治病救人之目的，也被称为人道主义医疗援助。^③在理想主义视角下，对外医疗援助是以“人道”和“正义”为基础，^④以受援国卫生系统为资金投入渠道，^⑤致力于改善中低收入国家的医疗卫生状况，并为此提供财政和实物捐助。^⑥

无论是“利益中心论”还是“受援者中心论”，都是从援助国的视角出发，而忽略了受援国在接受医疗援助时的能动作用。关于中国对外医疗援助，从文化背景来看，基于中国“关系本位”的社会文化和不附加任何条件的援助前提，中国从始至终尊重和重视受援国的需求。因此，立足中国文化的关系理论，恰恰弥补了对外医疗援助研究视角单一的短板。从研究主体来看，由于涉及援助国与受援国的互动关系，单一的研究视角存在一定局限性，关系理论强调援助国与受援国之间的互惠性，能够更好地剖析互动过程及其内在逻辑。

① 张春：《医疗外交与软实力培育——以中国援非医疗队为例》，《现代国际关系》2010年第3期，第49—53页。

② 陈水胜、席桂桂：《民生先导还是民主先导？——从对非援助看中国的援助外交》，《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3年第1期，第18页。

③ 王畅：《新中国对非洲医疗援助外交研究》，上海外国语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年。

④ Brian R. Opeskin, “The Moral Foundations of Foreign Aid,” *World Development*, Vol. 24, No. 1, 1996, pp. 21–44.

⑤ Suejin A. Lee and Jae – Young Lim, “Does International Health Aid Follow Recipients’ Needs? Extensive and Intensive Margins of Health Aid Allocation,” *World Development*, Vol. 64, 2014, pp. 104–120.

⑥ “Financing Global Health 2012: The End of a Golden Age?” Insti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2012.

交换论思想广泛应用于各个研究领域，通常与互惠规范、权力分化相联系。^① 比如，依据礼物交换论对援助进行分类，可分为关系型援助和支配型援助。^② 依据社会交换论，援助关系本质上受共同利益的驱动。^③ 交换是行为个体基于回报期望的自愿行为，^④ 关于交换过程的理性和非理性判断，还需将其置于特定的地缘与文化情境。文化塑造了社会科学理论，^⑤ 中西方文化差异则影响了交换过程的关系性。关系具有情感性和工具性的双重特点，中西方社会对于关系有着不同理解，进而也形成了不同的对外援理论。

在西方社会，交换关系侧重于工具理性，主要分象征主义和实用主义两个学派。象征主义主张象征性交换，即交换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维系社会秩序的象征体系。实用主义流派则主张利益性交换，认为社会交换的动力来源于对回报的期望，包括行为主义交换论、结构主义交换论、相互依赖理论以及交换网络理论等。基于团体格局、个人主义和自我取向的社会特点，西方社会学侧重于实质主义，即行为体本身是可以依据自身意志采取行动的理性个体，从而孕育了西方文化背景下的行为关系理论。尽管西方理论侧重于探究国际制度与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对国家对外援助行为都具有解释作用，但都忽视了“关系”这一重要的社会因素。

不同于西方将关系过程物化为机制形式，在关系本位的中国社会，^⑥ 基于差序格局、集体主义和社会取向的特点，社会学研究侧重于关系主义，即行为体是社会关系中的个体，社会关系模糊了个体界限。中国历来注重集体先于个人，社会利益优于个人利益，中华文化塑造了中国社会的“关系面向”。在儒家文化下，社会生活中关系互动的逻辑基础是“付出—获得”的因果规律，其实质是要在社会生活中实现“给予—回馈”的平衡。从这种文化出发，秦亚青认为，在关系建构过程中，各行为主体遵循关系性逻辑，互动由关系驱动，关系确定身份，身份界定关系性利益，利益驱动行动。^⑦ 在中国式的“关系选择”中，情感

① Baldwin, "Exchange The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Negotiation*, Vol. 3, No. 2, 1998, pp. 139 - 149.

② 刘毅：《关系取向、礼物交换与对外援助的类型学》，《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 年第 12 期，第 71—94 页。

③ 丁韶彬、阚道远：《对外援助的社会交换论阐释》，《国际政治研究》2007 年第 3 期，第 38—55 页。

④ Peter M. Blau, *Exchange and Power in Social Life*, New York: Wiley and Sons, 1964, pp. 91 - 92.

⑤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外交评论》2019 年第 6 期，第 1—10 页。

⑥ 梁漱溟主编：《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6—91 页。

⑦ 秦亚青：《关系本位与过程建构：将中国理念植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社会科学》2009 年第 3 期，第 69—86 页。

性关系超越了利益的理性计算。^① 关系互动通过主体间互动实践培养集体情感、催生集体认同，并由此确立主体间身份架构，规定主体间关系利益，塑造主体间互动模式，最终在实践中建构主体间关系。

对外援助一方面是国家间关系互动行为，主要属于国际社会范畴；另一方面是交换关系行为，其行为逻辑需要基于援助国和受援国的双重视角，并以关系连接为研究方向。同时，考察某个社会圈中的关系，还要注重以本土文化解释行为体关系的运作机制与逻辑，^② 从而使研究成果与实践具有更高的契合性。因此，中国对外援助既不适用于现实主义的“援助者中心论”，也不适用于理想主义的“受援者中心论”，而是一种基于关系理论互利、双赢的社会交换行为。^③ 不同于以利益为中心的西方援助，中国对外医疗援助是在正确义利观指导下的关系交换。本文以中国语境范畴下的关系理论为依据，探究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过程；基于医疗援助“馈赠—接受—回赠”的交换逻辑，探究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本质，即通过援助实现互利互惠，进而构建中非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关系互动

在过去三四十年间，“关系”引起了不同领域学者的关注，一种多立场的“关系”理论开始形成。^④ “关系”是时空单位内行动者或团体间各种社会关系的集合模式，涉及关系情境和行动者互动。^⑤ 在中国的社会情境下，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属于关系面向。结合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具体实践，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医疗援助与受援的互动过程遵循关系发展的规律，双方在医疗援助领域的交流合作是关系得以发展的前提。

根据中非关系互动过程的分析框架（图2），关系性本体首先设定了行为体的关系网络，互嵌式的主体间互动界定了双方的社会身份，^⑥ 置于关系网络的各个社会身份节点驱动了适当的关系行为。中国式关系具有由近及远、引远入近、

① 黄光国、胡先缙：《人情与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领导文萃》2010年第7期，第162—166页。

② 边燕杰：《关系社会学及其学科地位》，《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第1—6页。

③ 庞海红：《冷战后中国对GMS国家的援助——社会交换论的视角》，《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3年第4期，第85—88页。

④ 翟学伟：《关系研究的多重立场与理论重构》，《江苏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第118—130页。

⑤ 曾国权：《“关系”动态过程理论框架的建构》，《社会》2011年第4期，第96—115页。

⑥ 庞朴：《“中庸”平议》，《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75—100页。

跨越边界等特点,^① 在中国与非洲国家“拟亲化”的互动过程中,中非双方经历了认同集体身份、对等集体权力、确认集体利益、升华集体情感的“关系选择”。在互动过程中,关系世界的权力是关系性权力,利益是关系性利益,行为体间往往不存在关系身份与关系权力的绝对平等。中庸辩证法认为事物皆有两极,两极虽各有差异,但互存互容,和谐而非斗争是建构关系的路径,即在中国社会的关系情境下,主体间关系整体上会走向和谐化和长久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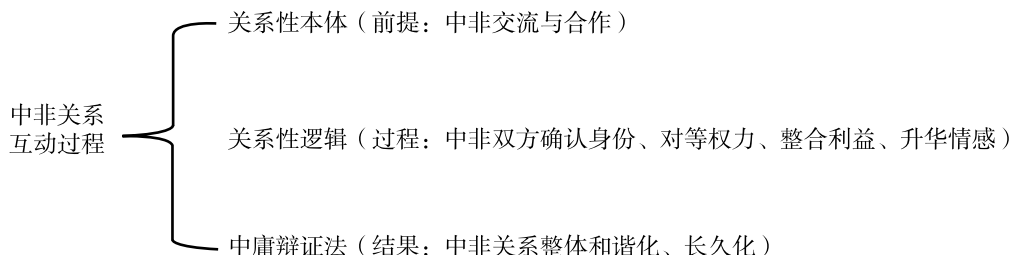


图2 中非关系互动过程分析框架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结合中国与非洲医疗援助与受援的关系互动,可以发现中国与非洲的交流合作是双方互动的前提,医疗援助是中非在医疗卫生领域关系得以发展的有利载体。中国和非洲有着历史联系和共同利益,中非双方都曾经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过程,也同样面临国内发展和提升国际地位的重要使命。^② 在医疗援助与受援的实践过程中,中非间互动增加,联系也更为紧密。

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基于双方关系身份同权力利益的对等。回溯历史,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具有利他和利己的双重属性,医疗援助的互动过程满足权力和利益对等。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外交需要,积极寻求和争取“中间地带”国家的国际支持。^③ 非洲国家则面临民族独立及应对国内医疗卫生条件落后等问题。到 20 世纪 70—90 年代,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生产原料短缺和供需市场活力不足的困境;非洲经济发展则面临国内卫生条件恶劣、适龄劳动力死亡率高的困境。20 世纪 90 年代至今,非洲国家全面转型,社会资源大量消耗,亟待其他国家提供援助支持。出于获取政治支持和人道主义的考量,中国通过医疗援助促进了中非关系发展。中国对非医疗援助不仅改善了非洲当地的医疗卫生条件,还促进了中非经

① 梁漱溟主编：《中国文化要义》，第 76—91 页。

② 孔箫苓：《中国对非洲卫生援助再思考：趋势，成效与限制因素》，硕士学位论文，北京外国语大学，2016 年。

③ 蒋华杰：《中国援非医疗队历史的再考察（1963—1983）——兼议国际援助的效果与可持续性》，《外交评论》2015 年第 4 期，第 61—81 页。

贸往来，满足双方密切联系和维持良好关系所需的对等条件。以兼顾国家利益为前提，中国对非医疗援助是承担国际道义的表现，而非洲国家接受医疗援助并予以回馈，则是在关系权力对等条件下承担义务的表现。基于中非关系身份同关系权力的相对平衡，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关系得以长久化。

在双方关系趋于“和”的同时，也要承认两者关系会出现“不一致”的可能性。在关系理论的视角下，中庸辩证法认为双方关系从根本上会趋于和谐。^①在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实践过程中，中非同样存在着主体间由于认知差异而出现关系权力与自我认知不一致的情况。当认知出现差异时，国家间关系及国际环境都会影响援助行动的推进。例如，由于台湾问题，中国曾两度与利比里亚断交，并撤离中国援利比里亚医疗队，两国复交后又恢复派遣中国医疗队。同样，中国援非医疗队也曾撤离中非共和国和尼日尔，待双边关系正常化后又重新派出。^②此外，由于战乱，中国医疗队还曾撤离索马里和刚果（金），这属于不可抗力因素的影响。

在中国和非洲追求对等关系的互动过程中，外交、安全甚至经济、文化等因素，都有可能影响双方在医疗援助中的关系互动。然而，基于“共生互补”的观点，双方可能存在的认知不对等恰恰为行为体提供了一个相互了解的机会，为国家间交流提供了平等对话的机会。通过和平磋商，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过程以“和”为趋势，本质上是和谐发展，即在中国“关系面向”的文化背景下，中非关系展现出共生促进、互补同行的共赢态势。

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关系建构

基于前文有关中国对非医疗援助互动关系的探究，双方关系发展的原因在于关系身份同关系权力的对等。从关系互动的本质出发，本文认为在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过程中，关系的最终建构源于双方期待一致及互惠本质。因而，以下部分将依托中国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在关系建构的框架下，进一步探究促进医疗援助关系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逻辑。基于医疗援助的交换关系，本文提出两个假设，并以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过程为例，尝试就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关系进行建构与分析。

① Qin Yaqing,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 18, No. 1, 2016, pp. 33 – 47.

② 李安山：《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外交评论》2009年第1期，第25—45页。

（一）建立假设

假设一：建构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关系再现了中国与非洲国家间关系的互动过程，本质上符合中非关于权利与义务、利益与道义相统一的期待，是互惠而不是单方受益。

关系建构过程经历了关系互动实践—关系选择—关系建构三个环节。关系互动实践以主体间交流合作为前提，意味着关系连接不断强化，共同利益不断扩大，从而增进了主体间情感联系，促使行为主体获取情感共鸣并产生集体认同。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关系，本质上是双方互相满足各自需要的过程和行为，是双方在互动过程中基于身份同利益对等，期待一致，集体认同构建最终关系的阶段性成果，即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关系建构源于互惠互利。

从关系选择来看，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关系互动构成了一种“馈赠—接受—回报”的良性循环。其中，期待一致是关系建构的根本原则。在关系建构过程中，依托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双方期待的一致性权利与义务、利益与道义的统一，是对物质资源及非物质资源的期待一致。一方面，关系建构遵循权利与义务的一致。中国与非洲国家是平等的，拥有同样的权利，并在社会关系中表现出由义务驱使的自发行为，即援助行为的背后蕴含着“馈赠—接受—回报”这一义务性的社会与道德规范。与此同时，若一方接受权利后不及时履行回报义务，往往会处于被支配地位，即关系的不对称会造成主体间关系互动的不平衡，而回报是恢复双方关系平衡的唯一方式。另一方面，关系建构遵循利益与道义的一致。在尊崇道义的中国社会，提供公共卫生产品是一种赠予行为，但并不意味着“免费”或“没有约束力”。^① 作为回归群体性道义的路径，提供公共卫生产品同样遵循“孔子改善”思想，即在维护自我利益的同时保障他者利益。^② 在关系建构过程中，中国既保障本国利益，也帮助非洲国家受益，具有互惠性。通过衡量权利与义务、利益与道义的价值，中国对非医疗援助是积极互惠的行为。频率越高，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关系就越向好发展，关系的建构则会越牢固。本质上，基于中非双方的期待一致，互惠互利是中非医疗援助互动关系得以建构的根本缘由。

假设二：在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关系中，双方可能会存在期待不一致的情况，即双方并非完全处于强关系地位。

① David A. Baldwin, *Economic Statecraf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② 赵汀阳：《天下：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9 期，第 100—108 页。

关系最终是在增进社会团结、维系社会秩序的互动过程中建构的。按照霍斯曼“攻击—赞同”命题，当能够获得期望的报酬或比预期要多的报酬时，行为体会继续重复获取报酬的行为。^① 基于期待一致性，双方整体上会一直保持良性的互动关系，即在关系建构过程中以互惠互利为主，但这并不意味着双方的价值完全相等，而是从长期关系来看，双方的价值大致对等。^②

在相对平等的关系互动中，同样需要注意可能出现的期待落差。从关系角度来看，期待落差是关系和谐化过程中为求和谐而出现的实践形态。^③ 期待落差的出现会削弱关系强度，但如果将之简单视为双方关系出现问题的信号，则很有可能促使双方为了维持关系而忽视产生落差的因素，进而酝酿出更大的期待不一致。在中非和谐共处的态势下，不平衡的交换关系是出现期待不一致的缘由，这种不平衡归咎于权力和利益分配不平衡。在交换过程中，行为体之间权力和利益的不平衡普遍存在，占据优势的一方拥有更多讨价还价的能力。同时，主体间认知差异可能还会放大这种不平衡，处于弱势的行为体因而会产生更大的期望落差。主体间认知差异越大，期望落差就越大，不平衡状态也就越明显，从而导致主体间产生期待不一致的情况。^④ 在中国对非医疗援助过程中，由于对相互平衡程度的认知不同，双方可能会存在期望落差，进而出现期待不一致。

总之，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关系既要满足受援国的需求，也要承认援助国的利己性；由于关系建构是行为体的自愿行为，要承认援助背后“馈赠—接受—回报”的义务规范；在互动关系建构过程中，主体间关系出现良性发展态势，就是承认关系互动过程中因权力与利益不对等而造成期待不一致的可能性。因此，依托医疗援助的交换性质，以关系视角为分析路径，中国与非洲国家整体上的期待一致性和互惠性促使双方关系得以构建。

（二）具体分析

根据文章提出的两个假设，以中国对非医疗援助为例，在关系建构的分析框架下，结合前文假设，具体分析中国对非医疗援助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在中国对非医疗援助互动关系的逻辑框架下（如图3所示），中非双方确立援助关系经过了关系互动实践、关系选择、关系建构三个阶段。中国对非医疗援

① [美] 霍斯曼：《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谢立中译，江西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60页。

② Dean G. Pruitt, "Flexibility in Conflict Episodes,"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542, 1995, pp. 100 - 115.

③ 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第8页。

④ 秦亚青：《主体间认知差异与中国的外交决策》，《外交评论》2010年第4期，第3—7页。

助的互动实践是关系建构的首要环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立足于前期基础,依托公共卫生产品的供给,双方面临关系选择的过程。关系建构框架内,医疗援助作为双方关系的交换载体,在“馈赠—接受—回报”良性循环过程中包含了各种社会关系的全部,^① 承载着双方的共同期待,即发出“馈赠”“接受”及“回报”信号源于期待。由于双方存在各自的利益考量和身份抉择,医疗援助的关系建构过程往往面临期待一致和不一致两种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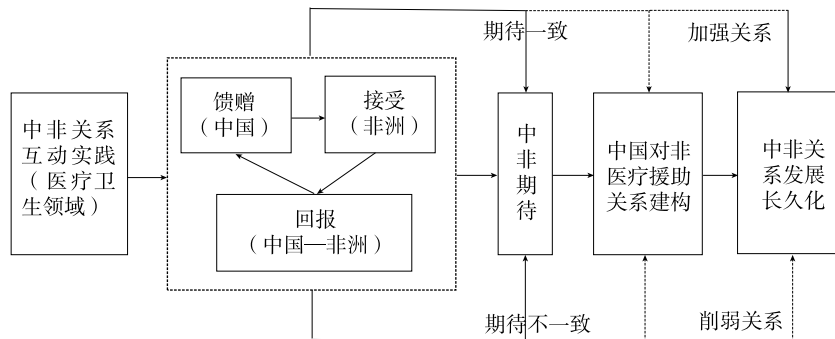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关系互动的内在逻辑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通过衡量自我与他者的期待一致性,双方经历了强弱关系的博弈。当双方主观认知中的身份与权力对等时,会产生期待一致的共识,从而促使行为体发出积极互惠的信号,以此巩固和加强双边关系。相反,当双方期待不一致时,行为体可能会在隐约意识到存在利益差异后选择忽略共同利益。^② 基于关系互动的不平衡,双方主观认知的差异还会进一步放大期待不一致,从而影响已有关系的建构效果。基于共同利益的考量,在地位相对平等的状态下,可以通过合理的公共外交战略、和平的磋商协调机制等方式将隐含的分配型讨价还价转化成显性的整合型讨价还价,即在医疗援助的互动过程中,双方的关系性利益符合共同期待,通过追求关系互动的相对平衡,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实现了互利互惠,从而促进双边关系可持续发展。

在医疗卫生领域,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关系建构是双方共同消解期待不一致的成果。作为对非医疗援助的重要形式,早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就向非洲国家派遣医疗队,以满足它们改善当地医疗卫生条件的需求。此后有更多的非洲国家向中

① 荀丽丽:《“礼物”作为“总体性社会事实”——读马塞尔·莫斯的〈礼物〉》,《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6期,第227—236页。

② Edward J. Lawler, “An Affect Theory of Social Exchang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107, No. 2, 2001, pp. 321–352.

国提出医疗援助请求，双方医疗卫生援助与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化。在“馈赠—接受—回报”过程中，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不断增加，并且在许多非洲国家的大力支持下，中国才得以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基于互相支持，中国进一步加大对非援助力度，促使双方关系建构深入发展。再如，埃博拉疫情暴发后，基于友好关系、国际责任和人道主义，中国第一时间向塞拉利昂、利比里亚、几内亚等非洲国家提供紧急的人道主义援助，成为当时中国应对公共危机持续时间最长、覆盖面最广、规模和力度最大的一次援助。^① 非洲国家对中国的及时宝贵援助给予广泛赞誉和高度评价，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家形象和国际影响力，中非友好关系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中非双方相互支持，团结抗疫，生动诠释了中非命运共同体精神。在中国抗疫的艰难时刻，非洲国家和非洲区域组织通过多种方式声援和支持中国的抗疫行动。非洲疫情发生后，中国第一时间驰援非洲，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涉及范围最广、实施难度最大的人道主义援助行动。中国向 53 个非洲国家以及非盟提供了大量抗疫物资，向 17 个非洲国家派出了专家组，并推动中国援建的非洲疾控中心总部项目提前开工建设。中国积极践行“将疫苗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承诺，向非洲提供疫苗援助，并帮助非洲实现疫苗本地化生产。中国还支持减轻非洲国家的债务负担，积极落实二十国集团“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议”。^② 2020 年 6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上提出四个“坚定不移”，提出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受到非洲国家普遍欢迎和大力支持，为中非医疗卫生合作和中非友好关系注入新动力。由此可见，在医疗卫生领域，中非关系是双向的，本质上是平等互惠的。

就国际形势而言，新冠肺炎疫情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国家间合作意识，增加了构建中国对非医疗援助互动关系的可能性。中国致力于推进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共同打造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实质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同样需要遵循关系建构的逻辑，重视国家间关系的良性互动，促进各方达成身份与权力相对等的共识，是在医疗卫生领域基于互惠本质塑造命运共同体，超越民族国家利益，为国际社会承担更大责任的表现。基于世界联合抗疫的初期成果，中国同欧盟的往来开始增加，中国同周边国家的关系逐渐改善，甚至部分西方国家还公开请求中国援助。^③

此外，健康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保障生命安全是国际社会的共识。通过抗击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人民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41 页。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时代的中非合作》，第 39—40 页。

③ 杨洁勉：《疫情和当代国际关系互动初探》，《国际问题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36—41 页。

新冠肺炎疫情，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认识到团结与互助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重要意义。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关系构建遵循人民至上理念，^① 双方对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有着一致期待。中国具备完整的医疗产业链、丰富的抗疫经验和医疗人力资源，基于不可替代的援助优势，其在双方互动过程中占有优势地位。然而，作为平等的伙伴，有别于西方带有附加条件的援助，中国以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为首要目标，以非洲民众最迫切的医疗卫生需求为出发点，寻求双方期待的最大弥合度和共同利益的最优共识。伴随着双方趋于一致的集体期待，中非在医疗卫生领域的互助合作不断加强，中非卫生健康共同体构建得以推进，并成为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在中国对非医疗援助互动关系的建构过程中，由于不友好的国际声音和外交形势，对中国医疗援助行为有时会出现不客观的误读，造成非洲民众的误解，从而影响医疗援助的效果。例如，由于外交关系的中止，中国援助塞内加尔医疗队曾一度撤离，直到双方复交后才重新派出。而在国际舆论中，中国往往被要求承担超过自身实力的国际义务。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虽然中国具备一定的提供公共卫生产品的能力，但实际上仍未拥有作为国际社会领导国所需的“秩序供给”能力。^② 基于国际舆论指向，非洲国家对中国提供公共卫生产品的期望也往往会超过中国的实际能力，从而可能出现期待不一致。此外，就中国而言，一方面基于命运共同体和良性关系的维系，另一方面基于国家道德和国际道义，中国将医疗援助优先提供给最需要援助的非洲国家。然而，由于疫情期间医疗物资全球调配的难度增大，疫苗供需矛盾突出，中国医疗援助或不能惠及每个非洲国家，或在内容和数量上存在期待落差，甚至提供援助的时间差异也可能会出现期待落差。

客观而言，中国对非医疗援助关系建构仍面临复杂挑战。但是，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逻辑不可逆转，双方关系的良性发展不会消失。双方的共同利益是客观存在的，当下双方的共同期待预示着双方良性关系的进一步升华。医疗援助本质上并不是经济交易，不能仅仅将医疗援助视为一种以利益追求为主的交换关系。中国从不以医疗援助来换取经济回报和国际地位，而是以提供全球公共卫生产品为己任，更看重医疗援助所体现的大国责任与担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典范，中国与非洲国家在医疗卫生领域将会构建出更加互惠和良性的互动关系。

① 王瑞、王贤斌：《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视域下全球疫情治理机制创新》，《理论建设》2021 年第 2 期，第 1—10 页。

② 李义虎：《无政府、自助，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疫情下的国际关系检视》，《国际政治研究》2020 年第 3 期，第 20—25 页。

结 语

相对其他几种理论,关系理论强调“关系”这一社会因素,符合“关系面向”的中国本土研究语境。作为促进人类全面发展的必要前提,医疗卫生对于非洲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医疗援助是中非关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载体,是中非传统友谊的重要体现。中国社会具有人情互惠性质,中国对非医疗援助的互动逻辑同样遵循互惠本质。虽然在互动过程中因双方期待落差可能会产生期待不一致,但双方关系的最终构建是行为体在承认期待不一致可能发生的同时积极磋商并最终认同彼此身份、对等各自利益和权力、统一整体期待的平等互利行为。

本文引入关系理论,主要目的是提供一些西方理论忽视或无法提供的研究路径。本文主要从关系理论出发探究医疗援助背后的逻辑,因此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在关系选择过程中,受援国与援助国的身份与权力是否一定对等?关系视角源于中国本土话语,这一理论视角是否适用于国际上其他援助与受援关系的探究?另外,本文仅是从国际关系的角度出发在医疗卫生领域进行的一个关系建构尝试,还需要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高度对中非间医疗援助互动关系继续开展深入研究。中非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了典范。^①医疗队派遣是中非间建立互信关系、树立良好形象的重要渠道,^②是中非命运共同体精神的最佳诠释。那么,从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理论视角出发,未来应该如何完善中国医疗队派遣体系和机制?这些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理解国际关系中国家行为路径和南南合作关系的内在逻辑,也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国家顶层战略设计背后的内在机理。

(责任编辑:贺杨 责任校对:陈雅慧)

① 吴传华:《中非命运共同体:历史地位,典范作用与世界意义》,《西亚非洲》2020年第2期,第12—18页。

② 李安山:《中国援外医疗队的历史、规模及其影响》,第25—45页。

China's Health Aid to Africa from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A Case Study of the Medical Team from Henan Province

Gan Zhenjun and Lai Weirong

Abstract: China has a history of sending medical teams to Africa for 60 years. Henan Province is one of the provinces in China which participated in the health aid to Africa in early days and has provided much health aid to Africa. Henan Province started its health aid to Africa by dispatching medical teams and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outcomes by innovating the content and forms of the aid. The management, selection, training, and welfare mechanisms of medical teams which are constantly improved provide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for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health aid to Africa by Henan Province. In a challenging environment, members of Henan medical team have inherited fine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promoted international humanitarian spirit, carried out the spirit of Chinese medical teams, and embodied China's unremitting pursuit of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health. This article focuses on China's health aid to Africa, takes the medical team from Henan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systematically examines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nd explores the spiritual and cultural core of Chinese medical teams as displayed by Henan medical team.

Keywords: Medical aid, the medical team to Africa from Henan Province, the spirit of Chinese medical teams, the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human health

Authors: Gan Zhenjun, Lecturer at Marxism College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Lai Weirong, Master's Candidate at Marxism College of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Research on China's Medical Assistance to Africa from Relational Perspective

Weng Lingfei and Meng Feidan

Abstract: Medical assistance is an effective way for China to participate in global public health governance. The free provision of public health produc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hina's foreign medical assistance. Therefore, the internal logic of China's medical assistance relationship is worthy of an in-depth discussion

referring to China'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diplomatic strategies. Africa is a major region in China's foreign medical assista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outbreak of the COVID – 19 pandemic, this paper takes China's medical assistance to Africa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explores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of providing and receiving assistance by analy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discourse system based on relational perspective. It builds the interaction model of “relationship interaction practice, relationship selection and relationship construction”, and attempts to construct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of China's medical assistance to Africa by making relevant assumptions.

Keywords: China – Africa relationship, relational perspective, medical assistance, public health products, a global community of health for all

Authors: Weng Lingfei, Research Fellow a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00); Meng Feidan, Master's Candidate at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00).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nd Traditional Governance Models in African Countries

Zhang Chun and Qu Shiyi

Abstract: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s a stage of political development for a country and a natural element of political advancement of human society. It is not unique to developed western countries or developing countries. All countries and nations must undergo a transition from underdevelopment to development in terms of political systems. After gaining independence, although African countries have faced many practical difficulties and challenges in domestic and foreign affairs, especially the threat of interference from western countries in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ffairs, they have actively explored their own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s and strived to move toward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As the COVID – 19 epidemic wreaking havoc across the glob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Africa has hit major roadblocks, revealing deficiencies in political governance. Against this backdrop, African countries need to further explore political development paths, accelerate political modernization, improve their governance capabilities, promot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the well – being of African people. Currently, there are mainly three manifestations of political modernization